



扬州大学中国史学科丛书

任鸿隽传

THE BIOGRAPHY OF
REN HONGJUN

黄翠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扬州大学中国史学科丛书

任鸿隽传

THE BIOGRAPHY OF
REN HONGJUN

黄翠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鸿隽传 / 黄翠红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7

(扬州大学中国史学科丛书)

ISBN 978-7-5201-0880-5

I. ①任… II. ①黄… III. ①任鸿隽(1886-1961)
- 传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4811 号

· 扬州大学中国史学科丛书 ·

任鸿隽传

著 者 / 黄翠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陈旭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17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880-5

定 价 / 8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任鸿隽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是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留美归国的新派学人。任鸿隽于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1912年民国元年随孙中山到南京，出任总统府秘书。此时的他信奉“革命救国”。孙中山辞职后，对政局的不满使得他决定远离政治，选择赴美深造。任鸿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攻读化学专业，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此后他坚信“科学立国”。

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从未中断过。然而，长久以来，国人所谓的学习西方科技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应急”之举，充满了极大的功利色彩。“常人心目中，几欲以工业代表科学”，^①但凡什么能强兵，什么挣钱，就引进什么。可以说，在清末民初国人学西方科技文明的潮流中，只有对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而未能实现科学的本土化。究其原因，在于国人混淆了科学与技术，重应用技术，轻探求理论，缺乏对科学内涵的真正了解。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实现“科学”的本土化，不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中国的科学永无发达之日，

① 任鸿隽：《科学与工业》，发表于《科学》第1卷第10期，收于樊洪业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简称《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53页。

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国家后面，拾西方科技之“牙慧”，国家永不可能强盛。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在于让国人了解“科学”的内涵，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功用等方面，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创造广泛而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需要设立科研机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简言之，当时的中国在科学的发展上，兼有“补课”与“追赶”的双重任务，科学启蒙与科学研究要同时并举。然而在任鸿隽所处的时代，这样的有识之士却是不多，而愿为此去身体力行，作不懈努力，并把这作为终身事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任鸿隽就是其中一员。

关于任鸿隽的一生，可以用其夫人陈衡哲一句话概括：“对于科学的建设与推进，实是任君一生精神生命的中心点。”^①任鸿隽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开创了中国科学传播的崭新时代，该社的《科学》月刊以美国的 *NATURE* 为楷模，为近代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榜样，走“民办”道路，通过募集资金建研究所、办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这样的综合性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是开创性的，与后来“官办”的中央研究院一“民”一“官”，交相辉映，成为民国年间中国科学体制里的两颗明星。任鸿隽带领中国科学社，以社中同仁的“民间”力量致力于面向大众的科学启蒙，致力于为科技人员创造交流和研究的学术空间。

任鸿隽十分清楚无论是进行科学启蒙还是促进科学研究，都需要有充足、稳定的资金和良好的组织管理，因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为他事业的第二个舞台。因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需要，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成立。中基会因其稳定而较丰厚的资金，中美董事共管、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力资助学校、图书馆、研究所的建设以及学者研究工作的开展。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为1949年以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时间最长的人）、董事会董事，参与决策和具体执行中基会的事务。他带领下的中基会为民国年间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提供了保障。

^① 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747页。

除此之外，凡是任鸿隽认为能够建设和推进科学事业的工作，他都愿意为之效力。抗日战争期间，任鸿隽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院总干事，带领这个当时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度过了内迁颠沛流离的艰难阶段。同时他亦是颇受高层青睐的教育管理者，曾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川大任期内，他以“国立化”和“现代化”为目标进行改革，奠定了川大良好的发展基础。因为他知道，除了独立的研究所外，大学是培养科学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发现科学新知、铸造科学精神的绝佳场所，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所大学走上这样的道路。

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紧紧相连，不以个人的仕途、经济为目的。他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但其抱负并不在三尺讲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亦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未就任），但仕途也不是他的追求目标。他自从在美国留学时就感受到西方世界因科学的发达而强大，由此立志要把“科学”传播回中国。自此，任鸿隽致力于寻找合适的途径向大众输送科学启蒙知识；同时致力于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氛围。总之，他希望从科学普及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最终其成就斐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推手”，中国科学界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人其事竟然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不为人重视。近来，人们开始通过研究民国年间的学术社团、相关文化机构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里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对中国科学社、中基会的研究已有相关成果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任鸿隽的身影时隐时现，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人物。如果能对任鸿隽的生平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会加深人们对民国科学社团、学术研究推进体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但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任鸿隽一生经历丰富，所处的时代变迁亦巨：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时代的变迁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亦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

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书的首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 (1886 ~ 1912)	1
第一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1
第二节 在革命的洪流中	17
第二章 留美时期的任鸿隽 (1913 ~ 1917)	28
第一节 主笔《留美学生季报》	29
第二节 创办《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	35
第三节 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	61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 (1918 ~ 1927)	68
第一节 试办实业	68
第二节 投身教育界	75
第三节 推进中国科学社的发展	104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 (上) (1928 ~ 1937)	119
第一节 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	119
第二节 任鸿隽与《独立评论》	140
第三节 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	150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下）（1938 ~ 1949）	196
第一节 领导中基会渡过难关	196
第二节 任鸿隽与中央研究院	210
第三节 任鸿隽与战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224
第六章 任鸿隽的晚年岁月（1949 ~ 1961）	238
第一节 政权更替时的抉择	238
第二节 在“统一”与“独立”间挣扎	246
第七章 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265
第一节 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265
第二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273
第三节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及评价	279
结 语	283
参考文献	288
附 录	300
附录一 川人哀告文	300
附录二 临时大总统告海陆军将士文	303
附录三 祭明孝陵文	304
附录四 中国科学社总章	304
致 谢	310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

(1886 ~ 1912)

第一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一 受熏于传统文化

1. 家世背景

任鸿隽，字叔永，1886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城一个小官吏家庭。

任家祖籍在浙江省吴兴县菱湖镇。浙江湖州一带历来是养蚕产丝之区，菱湖镇居民，“业丝者居其大半”，^①任家也是其中之一。任家家境殷实，业丝之余鼓励子孙读书。大约在1860~1861年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部攻陷浙江、江苏的杭嘉湖一带，菱湖镇居民听说“长毛”来了，四处逃散。动乱中，任家受到极大的惊吓，任鸿隽曾祖母因为手上戴着一付金手镯，遭到抢劫，手被打折致残；祖父则在动乱中被太平军抓走，太平军听说他是读书人，分配他做较轻的活，后家人用钱将祖父赎回。当初祖父被抓走后，祖母觉得生活无望，欲投湖自杀。因此祖父被赎回后，举家开始逃难。彼时任鸿隽的三叔祖任秋苹正任四川总督吴棠的幕僚，任鸿隽的祖父遂带领全家逃往四川投奔，任家这一支就此在四川落脚。到了四

① 任鸿隽：《五十自述》，《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675页。

川后，他们发现虽背井离乡，但似乎并不孤单，流落四川的同乡颇多，多从事“师爷”一行。浙江绍兴、吴兴一带多出师爷，任鸿隽的亲友中，除他的三叔祖任秋莘外，外祖父家和姨夫家亦是游幕四川的浙江人。^①

任鸿隽父亲任章甫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入川后跟随任秋莘学做师爷。当时学习做幕的方法是师带徒，徒弟要先熟读《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书，然后才能跟着师父学办案子，处理公务。等到案子办得熟练后，便可“出师”，获得被推荐出去做师爷的资格。但任秋莘不幸早逝，任章甫未能学成出师，于是只能另谋出路——“纳粟入官”。当时清末一大弊政，就是地方官员自府道以下均可以用钱买到，所谓“捐官”。不用说，大官需大钱，小钱只能捐个小官。任家因为经历逃难，家境渐衰，拿不出更多的钱，任章甫只捐得个小官，谋得垫江县典吏之职。任章甫在这个微小的官职上一做就是三十年，直至去世。据任鸿隽回忆，父亲乡土观念很强，入川多年仍刻意保留着乡音，还经常哼唱昆曲，以此来寄托思乡之情。任父一直没有放弃“还乡”的念头，但因薪俸微薄，加上为官清廉，始终没有攒够路费及返乡后的生活费而未能如愿。

任鸿隽的母亲闵氏同样出身于师爷家庭，母舅闵笠孙与任鸿隽父亲一样，属于游幕于四川的浙江人。闵氏受家庭影响，能识文断字，为人贤惠。闵氏比任鸿隽父亲小七岁，嫁入任家后，勤俭持家，精心培育几个孩子。正因为母亲的贤惠和持家有方，在任鸿隽的幼年记忆中，家庭生活是极其和睦而宁静的。任鸿隽兄妹的启蒙教育均是从母亲那里开始的，他们上学前就已经由母亲教会了上千个字，所以入学后一般小孩的发蒙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他们就不用读了。

任鸿隽兄妹七人均是在父亲到任垫江后出生。在四男三女中，任鸿隽排行第六，后面还有个弟弟。大哥任鸿熙生于光绪元年（1875），二哥任鸿泽生于光绪六年（1880），幼弟任鸿年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大姐嫁于涪陵舒家，二姐早逝，三姐终身未嫁。任家的几个孩子成长于一个充满书卷气、和睦宁静的家庭中，兄妹间始终感情深厚，相互

① 读书人中有一些专门为官员办文牍的，称为幕友。“幕友”有“刑名”和“书启”等分别，其中以“刑名”身份最高，因为要想成为刑名必须通晓律法，东家遇到疑难问题须能帮着出谋划策，兼当参谋。所以要想成为“幕友”，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学习。

提携。

垫江，任鸿隽生于斯，长于斯。对于任鸿隽来说，浙江吴兴仅仅是他的籍贯地，是停留在家人嘴边的一个缺乏鲜活影像的地名。1907年任鸿隽曾返乡寻根，然而结果很令他失望，祖屋、祖坟均无迹可寻，任家族人在菱湖已没有后人，唯一能找到的亲人是他的一位唐姓表兄。此后任鸿隽再也没有回去过，那里真正成为他的“故乡”了。

垫江通衢不便，既不通车，也不通船，十分闭塞。任鸿隽十五六岁才第一次去到邻近的重庆，路上要走五天，他对家乡的闭塞和由此造成的人们眼界的狭窄很有感触。^①

我记得第一次看见车船，是十五六岁时，同大哥到重庆，先走两天旱路到长寿，然后由长寿雇船走水路三天到重庆。那日到长寿后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江边去看船是甚么样子。使我惊异的，是船舱那样低小，人如何能钻进去。可是到真个下了船后，在舱内躺着看书，看岸上风景，也满舒服。至于车子（指火车），更是在光绪卅二年冬出外留学过汉口时才得见。在僻县生长的人，眼界真狭隘得可怜。

正因对家乡闭塞和落后深有感触，三十多年后任鸿隽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对四川大学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实现川大的“现代化”，提出川大的第一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要拿智识来开通，来补偿地形的闭塞”。^②

然而，任鸿隽虽长在闭塞的四川小城，却生于历来重视读书教育的浙人家庭；闭塞的小城只是暂时挡住了外面的新世界，优良的家教氛围首先把他带进了传统文化的领地。

2. 幼年求学经历

任家有一个很好的重视教育的氛围，孩子长到6岁，无论男女，都要上学。任鸿隽兄妹幼时，父亲均为他们延师在家就读。当时私塾受聘的先

① 任鸿隽：《前尘琐记》，《任鸿隽文存》，第698页。

② 党跃武主编《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115页。

生，常为本地的秀才廪生。给幼年的任鸿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塾师是徐甫唐先生，徐先生好诵读吟咏，任耳濡目染，受影响颇深，后来学的虽是自然科学，但亦爱好文学，并善吟诗作对。留美期间，他常有诗文与好友胡适等人应和，被胡适赞为佳品。

任鸿隽幼年所读，不外四书五经。一则父亲希望他走科举之路，二则四川地处内地，相对闭塞，少受西风美雨的影响。甲午之前，西学在四川的影响非常有限，所以父亲给他们延聘的老师都是传统文人。因为已在母亲那里受过启蒙教育，任鸿隽入学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朱子的《论语集注》，有十几本，叠起来差不多一尺高。6岁的任鸿隽感到畏惧，向父亲提出只读正文，不读集注，父亲不允。好在任鸿隽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所学书籍均能背诵。后来任鸿隽也不无自得的回忆：“我直到现在，《论语》、《学》、《庸》的注子大部分还能背得出。”^① 他的文章亦出色，所作策论文已为当地耆宿惊服。

1898年，任鸿隽12岁，四书五经已背得滚瓜烂熟，家馆已无法满足他的“胃口”。戊戌变法中，光绪下令各级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戊戌政变后，礼部奏请恢复书院时，慈禧以折中的姿态颁布懿旨：“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也不外乎此。是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② 这道懿旨既终止了“百日维新”中的书院改学堂这一变法措施，又为以后书院内部的改革提供了可能。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陆续办起了新的书院，新旧兼学。时任垫江县官赵哲濬提出复兴书院、提倡实学，从重庆聘请来两位山长。一位是廪生艾子熙（名缉光，治小学、词章），重庆东川书院山长吕翼文的得意门生，专教经学。另一位是庠生胡达之（名成章），专教算学。书院教算学在当地已是破天荒的事情，引起了很大轰动。

得到消息的任鸿隽与弟弟任鸿年一同投考，双双被取中做住院生。书

① 任鸿隽：《前尘琐记》，《任鸿隽文存》，第694页。

② 朱有瓚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453页。

院的日常功课，是点读《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之类，凡有心得或不懂之处，均做上笔记，呈给山长批阅。聪明好学的任鸿隽很快在书院崭露头角，每次月考均为第一，很得老师的器重。当时书院的月考是一件非常受重视的事情，除了能考查学生的水平外，名列前茅者还有“膏火”可得（每次大约制钱两三千文）。因为任鸿隽不是本地人，却每次都考第一，所以本地生员发起抗议，认为其非本籍，不应该占他们的膏火，此后任氏兄弟作出承诺——不领膏火，风波才得以平息。成绩突出的任鸿隽得以在当地书院继续读书，除他们主动承诺不领膏火，还因为山长艾先生的厚爱。艾先生还因这次风波，考虑到以后任鸿隽若要在垫江冒籍科考，当地生员必闹出更大事端，所以他建议任鸿隽到邻近的巴县参考，因为巴县是科考大县，每次参考的童生在万名以上，从不发生攻击冒籍之事。

——1904年，18岁的任鸿隽到巴县参加院试，在一万多名童生中考取第三名。后因科举很快废除，任鸿隽无意间成了科举的末班秀才。科举废除后，任鸿隽的求学之路该如何继续呢？其实在重庆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新旧的交替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断然和决绝，18岁的任鸿隽并没有显得无所适从，因为他已有了新目标。按照任鸿隽自己的说法，他到重庆参加院试是去“逢场作戏”的，他其实是冲着新开设的重庆府中学堂而去。^①

二 沐浴新式教育的曙光

1. 重庆新式学堂的首届学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庚子之变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清王朝的统治已脆弱不堪。为挽救自身的统治，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廷发布“新政”上谕，拟实施新政，“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

^① 任鸿隽：《前尘琐记》，《任鸿隽文存》，第699页。

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材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① 教育方面的一个新内容即为废科举、兴学堂。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清廷发布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② 被清廷扼杀的维新时期的书院改学堂再次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旨意，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大变革日渐明朗。当然，清廷的上谕仅是原则性的要求，至于怎么改，改后的学堂学制、科目设置等具体内容，上谕中并未明确。各省的书院改学堂颇有些乱弹琴的景象。后山东省最先拟定了新学堂的具体办法——《山东大学堂章程》，很快被清廷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在山东的带动下，各省也闻风而动，东南各省陆续在1902年出台书院改学堂的具体办法，书院改学堂逐步走向规范。在这股潮流下，相对闭塞的内地省份也不甘寂寞。四川总督奎俊回奏朝廷，将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创建的尊经书院改为四川省城大学堂，其他各府厅州县亦将书院改建学堂。据统计，1895年前，全国新式学堂仅有20所，1895~1898年间增加了19所。1901年，清廷发布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后，新式学堂方才大量涌现。1903年共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激增至4476所。^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鸿隽得以沐浴新式教育的曙光。1904年，他考入重庆府中学堂。该学堂由东川、渝郡两书院改组而成，是四川的第一所中学堂，不过任鸿隽觉得它仍然是“科举习气充塞其中”。其实这并非任鸿隽的个人感觉，而是科举废除前新式学堂的通病。新学堂里相当部分的学生是曾在县试、府试中名列前茅的高材生，甚至是“案首”（即县试或府试第一名），他们是冲着科举而来。清政府在书院改学堂的上谕中说得明确：“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在学堂中，旧学仍占据主导地位。^④ 另

① 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第3页。

② 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第7页。

③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254页。

④ 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第7页。

外，科举还未废除，士人仍然将其视为最佳进身阶梯而趋之若鹜。故而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们是身在学堂，心在科举！因为学堂与科举并行，学堂始终办不上路。

1905年，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的多次建议下，清廷于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发布上谕：“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① 科举的彻底废除斩断了读书人的科举之梦，新式教育得以发展。1905年中国的新学堂猛增，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达到8277所。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各学堂教学内容的变革，经世致用之学取代“四书”“五经”成为新宠。重庆府中学堂也很快显出不少新气象，渐具新学堂的内涵。

进入重庆府中学堂的任鸿隽时年已十八九岁，心智成熟，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新世界的向往是他前行的动力。学堂的校长（时称“监督”）是巴县举人、湖南候补知县杜少瑶先生。杜先生虽是个旧派人物，但并不十分顽固。而教员中有几位先生可谓新旧兼长，乃一时之名士。在重庆府中学堂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任鸿隽受益匪浅，新学堂不仅赋予他新知，更赋予他新的思想境界。教员中任鸿隽印象最深刻的是梅忞雨、孔保之和杨沧白等几位先生。任鸿隽后来这样谈及这几位老师及这段时间学习对他的影响。

梅先生授外国史、世界政治、世界地理诸科，孔先生授国文、伦理等科，杨先生授英文。梅先生所授诸科，仅及导言，然上下古今，清辩娓娓，实有以启发智慧、开拓心胸之效。当时从学诸人之感想如何吾所不知，吾个人之略解世界大势，梅先生启之也。孔先生之国文则授《马氏文通》，伦理则授严译《群己权界论》，于西方文字思想之大概，亦略有所得。杨先生年最少，来较晚，吾虽不获直接从事问学，然先生慷慨好谈国事，隐然以革命思想为青年领导。吾尤好从杨

^① 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41页。

先生游，故吾之革命思想亦于此植其基矣。^①

梅季雨（名际郇）和杨沧白（名庶堪）均是四川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二人为巴县同乡，1903年他们联络一批革命青年在重庆秘密建立了四川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常常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反清活动。同盟会成立后，“公强会”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孔保之为重庆府首批公费留日学生的监督，随同前往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师范，亦属较新派人物。在这几位先生的影响之下，这些青年学生不仅学术视野得以开拓，思想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已传入内地，但为清廷所禁，学生们想方设法获得之后，于深夜闭门阅读。有人偷偷翻印梁启超的《灭国新法论》一书，任鸿隽读后深受感动，对中国政治革新的渴望日渐增强。在新思想的启迪下，学生们对学堂的现状渐生不满，向学校当局提出改革建议。令任鸿隽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一律改长袍为短装，二是将体操改为枪操，并从府衙请得一批真枪，还请到一位当过新军的湖北人带操、训练。于是身穿与营勇制服相似的黑色短衣、手握真枪在江边进行军事训练成为任鸿隽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一幕。重庆府中学堂当时可以说是培养革命党的摇篮，包括任鸿隽在内的多名学生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当然，任鸿隽当时并未想到，多个同窗好友在他不久后的人生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任鸿隽的父母早在1902~1903年间相继去世，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境况十分窘迫，所以任鸿隽新的求学道路面临着经济难题。重庆府中学堂规定学生住校，伙食自备，每月制钱二千四百文，约合银元2枚，任鸿隽经常数月无钱付伙食费。但任鸿隽一贯聪敏好学，品学兼优，很得老师器重，所以连在任鸿隽眼中“官气十足”的杜校长也给他提供了资助：“有一天校长杜先生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阵，送了我七块大洋，使我得还清了伙食费。”^②任鸿隽还利用课余为别人抄书，

^① 任鸿隽：《五十自述》，《任鸿隽文存》，第678页。

^② 任鸿隽：《前尘琐记》，《任鸿隽文存》，第701页。